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四七期 ——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6c)

【史海钩沉】	彭德怀赴西南三线的诡异背景	马双有
【亲历者说】	北大文革“刺聂”乌龙	樊能廷
【追根溯源】	文革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	王克斌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二十九)	孙怒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彭德怀赴西南三线的诡异背景

• 马双有 •

1965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彭德怀，一番推心置腹的安慰和鼓励，甚至说了“真理也许在你那边”之后，要彭德怀赴西南三线任副总指挥，把压抑痛苦了6年的彭德怀感动得热泪盈眶，只好慨然应命。

对于这件事，历来的传记文学都给以很高的评价，毛泽东的秘书、警卫写回忆录，也都对此赞不绝口，说国家在危难的时候毛泽东总想起彭德怀并委以重任，这显示了毛泽东虚怀若谷，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知错能改，富于人情味和战友情的领袖风范，云云。

倘若不看后来的结果，只看现在的情景，这样的评价是不错的。但是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当时的形势和后来的结果，我们就会对这种评价打个问号，而又不得不大为惊叹，甚至惊出一身冷汗，对毛泽东整治彭德怀等人高妙的艺术手法叹为观止。

就在毛泽东召见彭德怀的几天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奉命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彭德怀，说是毛主席决定任命你为西南三线副总指挥。彭德怀以自己是戴罪之身，婉言谢

绝。这个被史家容易忽略的细节，其中大有文章。

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发炮弹，就是射向“二彭”：彭真和彭德怀。因为此二彭在毛泽东的印象中太坏了，简直罪不可赦。彭德怀在59年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发难，要清算毛泽东的错误；而彭真在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公然向毛泽东发难，要清算毛泽东的错误，说什么“毛主席也有错误，三五年过渡、公共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如果千分之一的错误都不检讨，将给党的历史带来恶劣影响”。公开叫板毛泽东，其胆大包天和彭德怀如出一辙。接着，彭真手下的“三家村反党集团”含沙射影批判大跃进，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而吴晗的《海瑞罢官》公然含蓄地要求为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毛泽东指示江青策划批判《海瑞罢官》竟然在北京行不通，非到上海发动不可，北京成了彭真一手遮天“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经姚文元执笔毛泽东反复修改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即将出笼，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让彭真约见彭德怀是何用意？

这是幕后导演策划的一出好戏。让敢于犯上的“二彭”见见面，说说话，看这一对倒霉蛋此时是如何表现，当然要记录在案，作为证据，到时候要一笔笔清算。毒蛇只有引出洞来，才好下手。

然而这彭德怀居然不为所动，当面拒绝了彭真。又马上给毛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不便出来工作。再说‘三线’的事情我不清楚，也不想去西南工作，还是愿意当农民……”。毛泽东接信后据说激动得一夜难眠，决定亲自召见这位老战友也是老对头。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见了彭德怀。6年未见，故友重逢，气氛是融洽的，感情是亲切的，尤其是毛泽东的谈话，推心置腹，入情入理，像一阵阵春风温暖着彭德怀冰冷的心：

“你这个人哪，还是那个倔脾气！平时总不来，好长时间也不写信，写信不写则已，一写就是几万言。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来，写个纸条来，花那么大功夫写长信干什么？你费了力气，我也看不大懂，彼此都不满意，何苦？……你有话可以说，你还是政治局委员么，你还是我们的同志么！”

“历史上，真正的同志绝不是什么争论都没有，不是从始到终，从生到死都是一致的。有争论，有分歧，不要紧，要服从真理，要顾全大局，大局面前要把个人的意见放一放。所以，你来了，我欢迎！”

“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你呀，也不要发牢骚，不要把事情弄得一成不变，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么！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能等，要振作，要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我没有忘了你，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

“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你彭德怀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德怀，还是去西南吧！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做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打仗去。”

毛泽东这番话可谓掏心掏肺，入情入理，委婉动听，暖入心扉。6年来受尽批判打击浑身冰冷的彭德怀，一听到这掏心窝子的话，立马激动得浑身热流激荡，眼里闪出泪花。他激动地答应：“主席，我听你的，我去西南！”

但是，上述谈话真的是毛泽东真情实感的流露吗？此一番话是真话吗？毛泽东真的幡然悔悟，冰释前嫌，要重用彭德怀，要给彭德怀一条光明的前程吗？

彭德怀当时一定以为毛泽东说的是真话，要不怎么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呢！但是，当一年后他又被抓进监狱，遭到一连串更大的打击的时候，很可能要对这“真话”打个问号，因为彭德怀的人生道路在此经历一段曲折之后，又跌入了黑暗的深渊！

现在我们用冷静理智的眼光对毛泽东这段话予以质疑，会发现很多破绽。这些质疑肯定在彭德怀的心中不停地翻滚，只是说不出口罢了。

彭德怀此时最关心的，或者说横亘在二人之间的大山，是庐山会议的冤案能不能翻的问题。如果毛泽东真的感念彭德怀，真的有所反思和忏悔，二人一见面首先就要谈谈庐山会议对与错，围绕这个关键问题进行心灵碰撞。彭德怀心里肯定有强烈的疑问：

我的意见书，经过三年严重灾难的实践检验，一条一条究竟错在何处？八届八中全会做的“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现在看来其正确性还有几何？我通过调查研究，就向你申诉，为什么越申诉遭到的批判打击就越厉害？七千人大会县委书记都能参加，为什么我这政治局委员却不能参加？大会后那么多冤案都能平反，为什么我的就不能？你说我“里通外国”“组织反党集团”，6年来查出什么证据了？查不出证据就应当把这帽子给我摘了吧？我豁出命来写了8万言书，你说你看不懂，其实就是一句话，庐山会议我没有错，给我平反。你说真理也许在我这边，庐山会议批判我错了，过了，那能不能开一个会议，发一个文件，把我的帽子摘了再去西南三线……

涉及彭德怀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毛泽东一个也没有交底。对于庐山会议的核心问题，毛泽东也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这就为以后彭德怀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那么，毛泽东让彭德怀去西南三线任副总指挥，是不是对他的重用，给他的一条光明路呢？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陷阱，让彭德怀心甘情愿糊里糊涂往里面跳。众所周知，再有一个多月，由毛泽东设计、江青策划、姚文元炮制的打向彭德怀的重型炮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即将发射（历时七八个月，毛泽东至少修改了8遍，1965年8月已经定稿）现在炮弹已装进炮膛，随时就要开火。此时让彭德怀去西南三线，毛泽东可能担心炮弹一旦发射，彭德怀会在身边大喊大叫，不好收拾。将他发配到遥远的西南，可避免这火炮筒子在京城惹麻烦。

为什么不将彭德怀发配别的地方，而要发配到西南呢？这更包含毛泽东让人深不可测的另一层高妙设计。

人所共知，西南局第一书记、三线总指挥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是毛泽东最宠信的极左大将，不仅在历史上和彭德怀有过节，而且对彭德怀的“右倾”视若仇寇，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急先锋，回到四川又用“钓鱼法”召开全省干部会议，先不讲庐山会议精神，而是先将彭德怀的意见书发给与会者，众人不明就里，大都表示支持彭德怀的意见，李井泉“按图索骥”，揪出了一大批“小彭德怀”。由于左祸肆虐，四川三年大饥荒饿死1000多万人，名列全国第一。其它省的左祸首领如吴芝圃、曾希圣等人均被拿下，而李井泉却巍然不动。李当然对毛泽东更是感恩戴德。李井泉更有一个超凡的特点，就是最能“正确”理解甚至能从反面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譬如毛泽东要求纠左，他偏反右，结果受到毛的赞许。譬如这次，毛泽东说，彭德怀到西南，李井泉要多多支持，好好安排，李井泉就会这样理解：对彭德怀要处处设置障碍，要密切监视其行踪……

所以，毛泽东让彭德怀去西南三线，既可以撇清自己的责任，又可以让李井泉严密监视彭

德怀的一言一行，为以后收拾彭德怀积累罪行材料。

果然，彭德怀前路坎坷重重。人在北京还未出发，11月10日，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便发表了。彭德怀忧心忡忡刚到四川成都，11月30日，这篇文章便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推出。一前一后两发炮弹，尤其是人民日报的炮弹，把彭德怀炸得目瞪口呆，遍体鳞伤。他回想着报纸上那尖刻而阴毒的语言，一行行犹如一条条毒蛇在吞噬着他的心！他激愤地说：“我想不通，我要给毛主席写信，向他请教，问问他是怎么回事？”然而犹豫再三，强压怒火放下了笔。

他以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的身份上任工作，那些来向他汇报工作的厅局级干部都事先接到李井泉的指示，一个个对他都是怀疑的眼光，批判的口气。他们都知道这位彭老总虽然功勋卓著，但早已是毛主席打倒的死老虎，是李书记的手下败将，人民日报姚文元文章的矛头就是指向他的。

尽管如此，彭德怀依然为三线工作殚精竭虑，风尘仆仆四处视察，7个月跑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写了4篇文稿，一心扑在三线建设上。但他怎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

1966年5月28日，在三线建委传达中央《五一六通知》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彭德怀又成了被批判对象。李井泉声色俱厉要他承认庐山会议上揭发出来的一系列罪行，要他交代到西南后所犯的新的“反党活动”。陪同彭德怀视察的一些人也突然变脸，落井下石地揭发彭德怀“到处放毒”“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妄图翻案”。这样彭德怀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而且是“现行反革命”！

这样一来，一年以后抓捕、囚禁和痛批彭德怀就有理有据，铁证如山了！

还有，毛泽东在颐年堂召见彭德怀时，随后又让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参与接见，也颇耐人寻味。此三人是文革初期毛泽东首先打倒的走资派，尤其是刘彭，是毛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毛此时让此三人接见彭德怀，也有冷眼观察之意。果然，在1967年批判彭德怀时，江青说道：“毛主席召见彭德怀时，刘少奇竟然说，你好好干，将来还可以当国防部长（一说是彭真语）可见刘少奇和彭德怀相互勾结，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和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我们和他们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江青并未参与接见，这话从何而来？肯定是毛泽东透露给江青的。

总之，毛泽东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这颗射向彭德怀的重型炮弹即将发射之时，于1965年9月接见彭德怀并安排他到西南三线，并非人们常说的“国有危难，便要重用彭德怀”，并非让彭德怀在三线搞出点“名堂”，将来可以带兵打仗，而是毛泽东精心设置的一个圈套，或者说是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这样做既可以方便自己在北京动手，又可以撇清自己的责任，还可以为以后监视、囚禁、批判彭德怀埋下伏笔。

而毛泽东对彭德怀一番推心置腹、委婉动听的谈话，也并非人们常说的虚怀若谷、幡然悔悟，而是表面和悦，暗藏玄机，哄他高兴，请君入瓮，让彭德怀心甘情愿地往陷阱里跳！

□ 原载《共识网》2014-06-17

~~~~~

【亲历者说】

北大文革“刺聂”乌龙

• 樊能廷 •

1968年3月29日北京大学化学系男学生宿舍三十一斋发生两件震动一时的事：“3.29大武斗”和“黑把匕首刺杀聂元梓”。

### 一、樊能廷：3.29亲历经过

1968年3月29日凌晨一两点钟，用扎枪、柳条帽、黄色军棉袄统一装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切断北大31斋化学系男生宿舍楼的电源，向睡梦中的井冈山兵团03纵队的学生发起武装突袭，在这幢南北长八十多米、南北两横三十多米、呈工字型的四层楼内（31斋具有东、南、北三个双扇对开的楼门），逐屋、逐层地驱赶属于井冈山兵团一派的学生。

我是井冈山兵团03纵队“慨而慷战斗队”成员，住31斋南头、走廊西侧119房间（从1963年9月中旬，因河北大水铁路被断而延迟报到两星期，到1968年3.29事件发生，一直住这个房间）。当下受到大惊动，急忙穿上棉衣，开房门，向南，想出南门。谁知道，南门被竖立的木板床挡着。幽暗的光线下，从板床及并立板床之间的空隙，恍惚看见壁立的板床外边有扎枪晃动。

见势不妙，我循31斋一层南横楼走廊，跑向厕所和盥洗室，两处都是门朝走廊、窗朝北。厕所窗户打不开。我跑到隔壁的盥洗室，蹬着长长的水泥池子，拉开窗扇。窗台离外面的土地地面一米多高，登上窗台，噌一下子就跳到外面的土地上。

接着，绕过南横楼西面，向东往28斋跑。由西向东过31斋南门，南面山墙外边，已经有几个人聚集在那里了，都赤手空拳的，不是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人，我与他们汇集在一起。

北大化学系住31斋二楼、三楼的井冈山兵团一派0362的男生，实在无法从楼道跑出去的人，有十七人是跳楼出去的。跳楼出逃的学生，有几个受了摔伤，手腕骨折、肋骨受损……

井冈山兵团一派，没有武斗队组织、没有武斗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根本无法抵御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这种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的有组织的武装突袭。手无寸铁而分散的井冈山派学生只能匆忙逃命，穿著单衣逃命者比比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的早春是非常寒冷的，他们损失了全部衣物、书籍、生活用品和财产，在寒夜中茫然的挨冻，怎能不对这种屠戮和施暴恨得咬牙切齿？

天亮的时候，衣着单薄逃出31斋的学生都在寒风中瑟瑟。按照当年节令和气温，正常人，百分之百都穿棉衣、棉猴乃至毛裤、绒裤。俄顷，传来井冈山兵团总部的安排意见，让大家进入32斋。在露天寒冷得不得了的学生们，一窝蜂进入32斋的楼房，各自找房间暖和暖和。大家找工具，整理房间，以便安身。

过了不大功夫，有人在32斋楼道里喊，“老佛爷露面了，在31斋”。“老佛爷”是“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派对于聂元梓的共同称呼。于是，一些人跑向31斋，我也放下手中正在干的活儿，夹杂其中，往西北跑向31斋。当时我在32斋的某屋整理双层木床，刚巧手中有一把改锥——是一把长不过二十厘米的红漆木把一字刃的中号改锥，劳动工具。

跑到31斋南门东边空地，看到，两三层的人群团团围着聂元梓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将军，激愤地申述、说理、讨公道。这些学生，既有31斋逃出来的，也有夜间从其他楼被

“新北大公社”武斗力量驱赶出来的。有人在推搡聂元梓，还有人，在聂元梓和李将军背后，隔着人群，举着一尺长左右的直径六分自来水管子，比比划划。

我从东面跑近人群。我到那儿的时候，李将军在左，聂元梓在右，二人并肩而立于人群包围中心（现在31楼南门外边电话亭的位置）。李将军不戴眼镜，穿棉军装，不扎武装带，外表没携枪，聂元梓戴白框眼镜，穿蓝色棉大衣；将军用右手揽着聂元梓的右肩，两人紧紧地挨着，都面朝东，将军右胸贴着聂的左肩。随侍的军人，紧挨着他们。再外边，是团团围着他们的人群。看到聂元梓，不由满腔愤恨，举起改锥，隔着两、三层的人，要打她。我中等个头，1米73，其实，就算我再高点儿，身高过人、臂长过人，加上改锥，隔着两、三层的人，也够不着聂元梓。

恰在此时，李将军大喊了一声什么，人群就迅速的分散开了。我在这个现场总共不到一分钟，没听见李将军喊的是什麼，也随着人群一哄而散，跑回暂栖身的32斋去了。

后来听说，李将军喊叫的是“有刺客”，或者“抓刺客”，而且李将军的喊声似乎是应我手中改锥的举起，脱口而出的。

## 二、李钟奇失口乱言 造就“惊天刺聂案”

无论是履行职务或曰执行任务，李钟奇将军在1968年3月29日早晨，在北京大学31斋南面山墙外空地上，和聂元梓并肩站立，亲兵簇拥，保护、支持了聂元梓。围着他的众多受害男女学生泣诉惨案真相、指控聂元梓，他好像一句没听进耳朵。

李将军身材不算高大，1968年，他正值壮年，和我们这些刚刚二十岁出头的文弱学生相比，他是很壮硕的。他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抵挡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保护聂元梓，应该是绰绰有余，何况他还带着随侍的军人？

另一方面，夜间一两点钟，在危急情况下，我被逼从31斋119室寝室，循一层的南横楼西北盥洗室跳窗逃生，跑了出来，仅以身免。虽说穿上棉衣了，连食堂的饭票都没有拿出来。到32斋用工具改锥和同学一起干活儿，哪来什么匕首？和同学一起闻讯跑向31斋，又何曾要刺杀聂元梓？

从时间点来分析，天亮以后聂元梓出现在31斋南门东南侧平地上。她跟李将军在一起，也就是上午七八点钟左右。按照正常的生活节律，是刚刚起床不久，还没到上班时间。这时候，李钟奇将军，已经从北京卫戍区来到北大，和聂元梓一起出现在31斋南门外。这是什麼样的节奏！

我从32斋去31斋，由东向西跑向人群。聂元梓、李将军面朝东，和我刚好对面。后来别人告诉我说，李将军指认，刺客是一个穿著黄棉袄、带着黑白边眼镜儿的年轻人。我没有“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那种黄棉袄，倒是穿一件当时空军军官的旧军装上衣，单衣，罩在学生蓝的棉衣外面。黑白边眼镜儿，那时叫做秀兰架。由于是面对面，李将军眼尖，指认得很真着，说是“穿黄军装、带黑白边眼镜”，确是我当时的穿戴。

聂元梓后脑勺受到皮伤，猜想是当时站在聂元梓、李将军背后的哪位仁兄给了聂一家伙。想想，单单31斋被武力驱赶出楼的就一二百男生呐。北大其他的学生宿舍楼，夜间，也有大量井冈山学生群众被“新北大公社”武力驱赶出楼。这些人都是义愤填膺，满腔怒火的。如果是我从背后扎的、刺的，我在他们背后，李将军不可能看背后看得那么真着、指认穿戴那么准

确。

李将军说“拿黑把匕首刺伤了聂元梓”，大谬！哪有匕首？是李将军“无中生有”！相信，在场任何人都没有匕首，莫非李将军有？

但是李钟奇将军误把改锥认作匕首，一惊一乍，大喊“有刺客”，他说是有人用黑把匕首刺杀聂元梓。李将军完全无中生有出一个“惊天刺聂案”，北大3.29事件的性质大逆转，不啻给3.29乱局平添了十倍的乱，对于北大形势造成的恶劣影响，简直无法估量。

百度百科《李钟奇》说“3月29日，李钟奇去北京大学制止武斗，实际上是表达了对聂元梓的支持。”信夫？

对我个人来说，则是：李钟奇失口乱言，樊能廷半世蒙冤。拜李钟奇将军赐，樊能廷背“黑把匕首刺聂”历史黑锅，久矣。1978年我去北大，有些同学见面，还称呼我“黑把匕首”。

### 三、谢富治：四点指示

3.29当夜，副总理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组织两派代表开会，批评两派之间发生的武斗行为。谢富治说：“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樊注：实际上，谢富治对于聂元梓、拥聂武装的行为，大容忍、特容忍。）

会上，谢富治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文件，说：“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二、井冈山等组织立即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四、在校军事人员，支左部队，要挺身制止武斗，保护小将，各派交出一切兵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

这就是北大文革史上著名的“谢副总理四点指示”，简称“四点指示”。

### 四、北京大学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作为

3.29北大井冈山兵团受到谢富治责难，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对于“四点指示”如奉至宝、喧嚣百日、火上浇油，加紧对井冈山兵团疯狂攻击。

当天，“校文革”发出《通缉令》，铺天盖地散发，“抓捕凶杀犯”。

“新北大公社”在全国“抓捕反革命凶杀犯”。樊能廷老家南京市中山南路404号，自家的楼房，红砖墙上被石灰浆刷上“捉拿反革命凶杀犯樊能廷”大标语，落款“北京大学校文革”。

1968年6月14日，北京大学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184—185期合刊，第四版刊登通栏标题《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数千字的文章和《为什么要死保樊能廷？》评论文章。

### 五、聂元梓：御前诬告

从网络披露材料韩爱晶《7.28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录》看，在1968年7月28日这个御前会议上，聂元梓说话机会不多。但是，有限的发言机会，只要她开口，

多半是诬陷他人。本文引用有关内容，看她在御前，毒汁四溅、血口喷人，咬农科院、咬地质学院、咬“有人刺杀”、咬侯汉清及至乃父、咬北大井冈山兵团、咬樊立勤、咬彭佩云、咬王力、关锋、戚本禹。真的技艺娴熟，片刻之间，咬了个一溜够！聂元梓的政治品质，可见一斑。

陪同毛泽东接见的有：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

聂元梓：……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

聂元梓：有人刺杀我。

毛泽东：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要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没有。

……

聂元梓：地质学院支持他们，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挂在树上。

……

聂元梓：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

聂元梓：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

聂元梓：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

江青：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没有搞他，他和彭佩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

毛泽东：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

毛泽东：侯汉清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是研究生，父亲63年搞投机倒把。

……

江青：最坏的，不是大组织，几个组织联起来背后有黑后台的，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

毛泽东：……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王、关、戚插了一手。

## 五、余波之一：李国俊《五绝一首》

北京大学03633班同窗、3.29同遭31斋劫难、四个月同守37斋的战友李国俊，在1968年，赋诗道：



烟酒寻常事，白下吊膀徒。错揩聂妇血，一举入名流。

这首调侃诗说：抽烟喝酒是樊的嗜好，所以“烟酒寻常事”。樊是南京人，白下是南京的古代地名，白下、建业、秣陵、金陵、建康、应天，这些都是南京的古代地名。樊是一个歪肩膀的人，左肩膀明显的比右肩膀高，称为“吊膀”，所以“白下吊膀徒”。1968年聂元梓已经是一个四十六七岁的中年妇女，称聂妇，不为不恭，所以“错揩聂妇血”。“一举入名流”，说的是，樊能廷把改锥这么一举，丑名远扬于北大了。

妙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揩……血”两个字，我不同意，这说我的改锥见聂元梓的血了。我确实没碰着聂妇，改锥上没有血。3.29早晨，我离开那个“刺聂”现场，立即回32斋继续用手中的改锥干活儿，根本没看见上面有任何血迹。

后来不止一位作者的文字，写到北大文革3.29武斗暨“刺聂案”，说“黑把改锥”、说刺聂见血，活灵活现的，其实谁也没有看见；甚至，我怀疑，他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见“刺聂”、见“见血”。

真实的情况是，聂元梓那天，头皮的左后部靠上位置，破了小拇指甲那么大一点儿皮儿，根本没有她在回忆录中说的“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那么惨人兮兮、那样白发三千丈的夸张。2014年5月，聂元梓耄耋健在，高寿九十三周岁矣，至今仍然无人拜识她的伤疤和所谓血衣——如果真有的话。

## 六、余波之二：理胜《忆北大文革旧事》

2001年，我在外地出差，有人向我询问搜索引擎谷歌网搜索，而且提议以我姓名为关键词。一演示，把我吓了一跳：我文革中有关3.29武斗和“刺聂”的事情，被人搞到网上挂着呐。那就是作者理胜的《忆北大文革旧事》。文中“刺聂”的时间、地点，惜有误。

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份写北大文革史实的非官方材料，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大名出现在互联网上。理胜文章正确地指出：“北大3.29武斗开北京高校武斗之先河，从此以后，各大学武斗迅速升级，清华、北外、京工、人大等校都出现了以武力把对立派赶出校区的现象。……武斗杀人，北大又一次走在北京高校的前面。”

## 七、余波之三：樊能廷《网友留言》

2006年，我在北大官方网站上见到一个关于3.29武斗和“刺聂”的材料，允许网友留言，当下我写了一小段留言。不想，以后很长时间都还保留在该网页上，还被多处引用。现在的网络上，这段文字镶嵌在“百度文库”理胜《忆北大文革旧事》文前，我的《网友留言》附丽了。

来源：网友留言

来源日期：2006-2-20

原文：武斗的后台是谁？

文革中首都各高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始于北大，北大有组织的武斗始于1968年3月29日凌晨。1968年3月29日凌晨，用扎枪、柳条帽、黄色军棉袄统一装备的新北大公

社武斗队（首领为聂元梓的密友高云鹏），切断31斋男生宿舍的电源，向睡梦中的井冈山兵团一派的学生发起武装突袭，在这幢南北长条的四层楼内，由北向南，逐屋、逐层地驱赶对立派学生。当时，井冈山兵团一派没有武斗队组织、没有武斗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根本无法抵御这种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的有组织的突袭。手无寸铁而分散的井冈山派学生只能匆忙逃命，穿著单衣逃命者比比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的冬天是非常冷的，他们损失了全部衣物、书籍、生活用品和财产，在寒夜中茫然的挨冻，怎能不对这种屠杀和施暴恨得咬牙切齿？化学系住二楼、三楼的人，实在来不及从楼道跑出去的人，有五六个是从窗户跳出去的。天亮的时候，逃出31斋的学生都在寒风中瑟瑟。有趣的是，住31斋的新北大公社一派学生，居然没有一位糊里糊涂的出逃，大都在热被窝中安卧（当然，拿着补助、执行这次突袭任务的人不在此列）。清华大学的学生组织领袖一看，北大聂元梓一派发动武斗，大占便宜，并且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领导人谢富治对于发动武斗的聂元梓和拥聂武装，根本不追究责任。清华大学的武斗局面，随之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如果说高云鹏为领导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是前台，则聂元梓就是后台。如果说聂元梓是前台，则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领导人谢富治就是后台。

这个“网友留言”准确地叙述了北大3·29事件。其实“北大3·29大武斗”不是什么武斗，而是拥聂武装力量有预谋地对于无辜的分散的和平群众的非人道的大规模屠戮和施暴，地地道道。如果非要把这种情形说成“武斗”，亚赛把当年日寇在南京屠杀三十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说成是“战斗”。

“北大3·29大武斗”中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打伤、砸伤、刺伤的，轻重不一，数逾百人；公私财产毁坏、损失无算。

文革中，在北大，策划、实施这样一个空前规模的军事行动，我认为，不是卢平、高云鹏能够自己背着聂元梓擅自作主的。聂元梓肯定知道军事部署，这一夜她一定激动、兴奋、焦灼。“网友留言”指她为3·29武斗的后台，一点儿也不冤枉她。怎奈聂元梓、卢平、高云鹏这一伙敢做不敢当的好汉，至今遮瞒，不肯公开事件的事实真相。

聂元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受到康生乃至毛泽东的支持，尽人皆知。康生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太好，在延安时我就知道。可是现在，就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我的“网友留言”指聂元梓的后台是中央文革，有任何一点讹错吗。在文革中，中央文革是中共实施文革的主力，是党内外文革力量的总后台，尽人皆知、无容置疑。

谢富治在文革中，听命于毛，积极卖力推动文革，迫害、伤害、得罪上层政治一大批人。这些人，或者说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文革后反过手来，得势了，对于谢富治进行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把他骨灰请出八宝山。上层领导之间的这种政治斗争，生情死怨，我们这些小小的老百姓就不得而知了。“网友留言”言及3·29事件的历史问责，必然涉及谢富治，如此而已。

从组织系统上说，当时谢富治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聂元梓是副主任，他们是同胞。从《聂元梓回忆录》洋洋自得的叙述看，聂经常利用谢富治、牵着谢富治的鼻子走，把谢富治玩弄于股掌之上。实际上，3·29当晚，谢富治就发表了著名的“四点指示”。“四点指示”的具体内容，根本不追问事实真相，一味偏袒聂元梓，即便谢富治事前不知道3·29武斗，事后可是鼎力庇护和支持聂元梓的。“网友留言”指谢富治是聂元梓搞3·29武斗的后台，一点儿也不冤枉他。就算他活到现在，还身居高位、权倾天下，账还是要这么算。“网友留言”直指谢富治，不是给他扣屎盆子、鼓破乱人捶，这恰恰就叫作历史问责。月前，韩国沉船，总理引咎辞职，这叫做历史担当。

聂元梓一派制造的北京大学3·29武斗事件，是北京高校大规模武斗的始作俑者，清华

大学学生领袖有样学样、步聂元梓后尘，旬日之后，在1968年4月份发动起武斗，并且迅速地由冷兵器升级到使用真枪实弹、爆炸品。到7月28日为止，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造成近二十条男女人命血案……

对于这段“网友留言”，到现在为止，我樊能廷不想作任何更正。它描述的，就是历史真实。没有真相的社会是一个极其可怕的社会。没有真实和真相，一切都假，世态堪忧。

#### 八、余波之四：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

早就听说聂元梓在国外出版回忆录，为她自己文革期间的丑恶言行百般粉饰，还指名道姓诬称3.29樊能廷用匕首刺杀她。国内见不到这本书。

2007年春，我偕同妻子王文芝去台湾旅行，来回路过香港。回程路过香港的时候，在香港国际机场书店寻找这本书，店堂的书架上没有，问店员，店员很热心地跑到库里翻找，居然找到了这本书。我陋见，这恐怕是聂元梓毕生最大的鸿篇巨制了，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版权，书号ISBN 988-97608-6-X；定价125港币买到手，带回北京。

对于《聂元梓回忆录》，薄亚达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书评，《专制政客的翻供状：评聂元梓回忆录》，网上很容易找到并且下载。无论我想说点儿什么，也说不到薄亚达先生那么周全、透辟。

我樊能廷只用四句话，回应聂元梓这本厚达500页的《聂元梓回忆录》：

惯于扯谎当真话，无中生有每自夸；顿顿静河任你笑，回忆录把视听遮。

（樊注：文革期间，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聂元梓充风雅，说她读书。读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她说出来，却是“肖霍洛夫顿顿的静河”，引起全场不分派别、不分少长、忍俊不禁的哄堂大笑。）

《聂元梓回忆录》涉及到北大3.29武斗以及“匕首刺聂案”的笔墨不多，第269—274页。她说：“在制止武斗中我也曾受了伤，流了血。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在楼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大包，我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他用匕首刺在我的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连我都被别人用匕首刺伤了，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我受伤以后，包扎了一下，我就又去“请”谢富治。对于用匕首刺伤我的人，我从未进行过追究，追究他干什么？他来刺我是受了蒙骗。”

关于北大3.29武斗和“刺聂”的各种说法，《聂元梓回忆录》的说法最离谱，时至21世纪，她还在施展几十年前的惯技，企图诳语遮天。

聂元梓出版《聂元梓回忆录》，是在服了十七年刑之后，她还摆着一副当年的臭架子，俨然是凌驾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之上的公正的领导。明明是她部署拥聂武装力量，3.29对于井冈山赤手空拳的无辜学生青年，进行非人道的屠戮、戕害和施暴；她却说成“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来李钟奇，帮助我制止武斗”。

聂元梓书中所述种种脱离事实的话，全都是经不住事实一驳的谎言。

1，聂元梓和李钟奇有军人随侍，不是两个人；2，井冈山总部根本没有单独占据任何一座楼，只是在28斋有几间屋子；3．29事件发生的时候，整体28斋还是不分派别、大家混用的男生楼；3．29事件发生后，“北大井冈山兵团海燕战斗队”，驱赶“井冈山兵团”以外的杂人，“井冈山兵团”从此独占28斋整个一幢楼房；3，本文已说明，所谓“匕首刺聂案”，发生在31斋南门外东侧空地上（现在的电话亭），离着28斋，间隔着东西长达七十米的30斋和两条马路；如果聂指认31斋是“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那么，聂元梓和李钟奇到这里的时候，拥聂武装已经完胜，31斋化学系井冈山成员已经逃之夭夭，新北大公社武装齐备的得胜之兵占领着这座楼；4，实在不知道聂书中说“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说的是什么时间点。我樊能廷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两三层的人群团团围着聂元梓和李钟奇将军，激愤地申述、讨公道。有人在推搡、围攻聂元梓；5，“我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他用匕首刺在我的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这个情况，绝对是无中生有。实际上，没有匕首、没有扎着、没有刺着、没有碰着，没有头顶受伤、没有血顺着脸往下流。聂元梓只是被器械从背后轻击，后脑勺碰破小拇指指甲那么大一点表皮而已。聂元梓一派何时、凭啥，凑成“樊能廷用黑把匕首刺杀聂元梓”案情的，更加无从得知。

聂元梓在书中自我标榜“从未进行过追究”，其实说到底，1968年3月29日“谢副总理四点指示”并没有点名“樊能廷”，倒是三十七年后，2005年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点了“樊能廷”的名，指名道姓进行诬陷。这就是聂元梓的“从未进行过追究”吗？青竹蛇儿口，黄蜂尾后针，一旦操话语，便把谎言吟。诚哉！

不难想见，如果不是7．28后军宣队迅捷进驻北大，如果井冈山兵团垮了，我樊能廷只落到聂元梓手中，恐怕难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了。

## 九、结语

文革中，1968年北大“3．29武斗”和“刺聂案”，是两件紧紧关联的事件，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没有前因，就不会有后果，提起“匕首刺聂”，就不能不说起3．29事件。

现在，我用亲历史实给各种说法以澄清、驳正：“3．29武斗”是屠戮，“刺聂”根本不存在，“黑把匕首刺杀聂元梓”是乌龙！解开这个云山雾罩的“乌龙案”，对于北大文革期间的震动事件，还历史以真实！

可能问，为什么不早一点把它说出来了？我也要问，什么地方让说？更与谁人说？

事件的发生，到眼下，已经四十六年了，我只是在2013年仲秋，做过一次当众的讲述和驳正。在场的除了我，还有十八位听众，那是北京大学03633班庆祝入学50周年的同学聚会活动，有人提问起来，我就坦白地实话实说一遍。此外就没有任何别的场合和机会，讲述这个事情；没有人给我条件说这个事情。大家都各自忙着过自己的日子，谁愿意管别人的闲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也就这么接近半个世纪地保留在自己的心底。

不在现场的人，误传消息，因为他们没有准确目击亲见，是可以谅解的，从而说法各异，与事实相去或远。事实真相只有一个，而流传的说法，甚至见诸文字的，却形形色色、差错纰误。我亲身经历这个事儿，是当事人；我的事，我想自己有责任说明真相，帮助误写、误传的人们澄清、驳正。

四十余年如一梦，亦幻亦真多半生。31斋陈迹犹在，原来是男生宿舍，现在变为女生楼，

男宾谢绝入内，往事无凭吊处了。

~~~~~

【追根溯源】

文革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

• 王克斌 •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 37 年了，保守地估计，文革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可能会持续百年，举足轻重。对文革的清晰认知和反思对于未来的国家走向有着深远意义。在文革的主力队员——40 后们——全面下岗以前，留下关于文革的宝贵回忆和总结，乃是义不容辞的大事。

1966 年夏，我正在清华读大二，遇上了历时十年的文革，停课闹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学生被卷进了空前未有的大风大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从批斗走资派和教授开始，一直发展到两派对立，刀戈相见，不共戴天。文革中死伤无数，被整肃过的人不下几千万。十年文革给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教育等多方面造成了无法估计的损失。如今，虽然没人会明目张胆地去实现毛主席的七、八年再搞一次的宏愿伟业，但是也没人能够保证，类似文革的事件不会再次发生。因而，认真总结一下文革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基础将有利于防微杜渐，避免重蹈旧日的覆辙。

一、文革产生的社会条件

首先，文革的产生需要一个睥睨万物说一不二的强权执政党，这个党全面掌管着国家机器，从国安国防，科学教育，工业农业，直到人们日常的思想生活。要在全中国范围内发动起像文革这样气势磅礴的群众运动，还必须有一位威望崇高振臂一呼的领袖。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伟人，他能使 7 亿人民山呼万岁，誓死追随。他让谁生，谁就能活，他要谁死，谁就得亡。他喜欢时，可以让你当主席，进党章，他气恼时，可以让你锒铛入狱，驾机出逃。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动辄把几十万人打成右派。他可以像一位牧主，挥着长鞭把数亿的农民赶进人民公社。他可以挑战上帝，让人们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祝他万寿无疆。他可以把人们分作两派，各自打着他的旗号，相互叫骂厮杀。他可以迫使百姓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他可以让臣民为了革命事业，父子反目，夫妻成仇，一个个红着眼睛，失去了人格和理性，像一群上了发条的机器人，等待着他的最高指令。没有这样一位叱咤风云顶天立地的领袖，就不可能掀起这样宏伟壮观的运动。

第二，要有一个基本上属于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厂矿，交通和学校属于国家企业或事业单位。工厂不管是赔了、赚了，工人照领工资。老师可以不教书，学生可以停课，免费搭乘火车汽车，四处串联，煽风点火，但老师薪水照发不误。工厂学校多年来被严格控制在党的领导之下。在公有制的保障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有一个铁饭碗，干多干少，报酬相同。不管你是造反派，保守派，还是逍遥派，不管你一天干几个小时，每月的工资分文不少。那些派往大学去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人宣传队则是 100% 的全脱产。这样一群不务正业的劳动者如果是在一个私有制的国度，早就被解雇了。至于那些学生，尽管 6 年大学没有读完，还是每人都得到了一纸文凭，不管是到了什么地方，每个人毕业后都有工作和收入。没有公有制作为这些“职业革命者”的经济后盾，历时 10 年文革恐怕连 10 个月也支撑不住。

第三，需要有好年景的自然配合，粮食供应丰富。革命意志再坚强的人也离不开口粮。中

国广大的农村，数亿农民的辛勤劳作，以及没有大旱大涝的干扰，使得人人都能保证30多斤的粮食定量。不仅如此，地方上还有不少单位为前来串联的红卫兵小将供应饭食。我在西交大串联时，学校为红卫兵准备免费水饺。在云南大学时，每天早晨享用蘸白糖的江米饭，比清华的伙食还好。如果在1960年的困难时期，人人食不果腹，面有菜色，地方上不可能为那么多学生提供吃住。中国的农民们用他们勤劳的双手，配合着风调雨顺的年景，让成千上万的东奔西走的革命家们填饱了肚子，去从事你争我夺破坏国家的恶性活动。

第四，执政党有绝对的舆论控制权，广播、电视、报纸全部掌控在党的手中。对毛主席发出的每一条最高指示，迅速传达不过夜，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以致毛泽东的任何决定和讲话都能及时地被传达到各个角落。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文革一开始就在单一舆论的驱动下轰轰烈烈地一层层地兴起风作起浪。宣传工作者用娴熟的笔杆热情地编织出一幅幅“红旗如海歌如潮，祖国形势无限好”的美丽宏图。1966年，毛主席身着绿色军装，多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小将，鼓舞士气，号召他们把文革进行到底。上百万的青年疾声高呼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云天，这些至今难忘的场面把青年学生的精神状态激发到最高的境界，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文革初期，这些热血青年可以说完全处于忘我的亢奋之中，这些人成了为文革奔走呼号摇旗呐喊的马前卒和急先锋。当然他们也从未怀疑过会被秋后算帐，批斗审查，甚至遭遇牢狱之苦。和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样，这些马前卒不过是被人利用完就甩掉的牺牲品，一代被社会无情抛弃的天真幼稚的愤青。

第五，从1949年建国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已经把国人驯化成崇尚共产主义，坚决跟党走的理想主义者。在反右斗争和大跃进之后，毛泽东树立了几大样板，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还有那位把党比作母亲、做好完事就写日记的雷锋同志。随着军队倡导的四个第一，全国各个单位，都把突出政治放到首位，提倡先红后专。工人、学生和农民都坚决听党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争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和好战士。在15年的时间里，从少先队、共青团开始，毛泽东把全体国民的思想意识的固有频率调节到他所期望的数值，以致在文革初期，他发出的每一指令都会在民众中产生全面的受激辐射，一呼百应，引起强烈的共振，焕发出排山倒海般的能量。毛泽东亲手完成的这项数亿人的思想再造工程成了文革产生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六，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老百姓不受人权保障，也不知道人权的意义。文革中，就连以人治为主体的公检法系统也陷于瘫痪，人们完全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因为一句话，一封信，一篇文章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屡见不鲜。一批又一批的百姓因为不同原因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失去人身自由。一个白发老人可以因为地主身份被打得皮青脸肿，死去活来。国家主席的夫人可以被揪到大学接受凌辱批斗。身经百战铁骨铮铮的将军元帅自身难保，东躲西藏。生命已经没有价值，个人已经失去尊严，人格已被严重扭曲。当然，这个条件也可以被看作文革的结果。

除了上边的六个相对静止的社会条件，文革的产生还有个动态(Dynamic)因素，那就是国内外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方针方面的斗争。50年代末，国际上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分裂，中苏交恶。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零星的几个朋友，唇齿相依的朝鲜，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和天涯若比邻的阿尔巴尼亚。60年代初，中共连发了9篇对苏共修正主义的严词批判，事态几乎发展到“卫星上天，人头落地”的危险地步。此时经过对某些文艺作品的批判和农村的四清运动，国内的路线斗争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国家主席刘少奇做大成了一字并肩王，其思想路线已经与毛相左，非有文革的特殊手段，不足以反修防修，打倒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警告人民，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文革是继历次政治运动之后达到的全剧的高潮，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终极体现。当然他也没有料到，在高潮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失落与困境，以及右翼的邓小平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代天骄的伟人毛泽东也

在孤独与惆怅中嘎然而去。

二、文革产生的社会基础

除了文革产生的社会条件，另一个需要面对的严肃问题是中国的百姓为什么能够自觉自愿甚至不惜生命地投入到这场运动？这就是文革产生的社会基础。

迄今对文革的评论大多集中于上层，集中于文革的总编导毛泽东先生，无疑这是正确的选择。然而，说文革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也好，都离不开这个下字；说文革是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也罢，都离不开群众。但是写群众很难，参与文革的有几亿人，故而只能采用抽象概括的办法，从个别事例里归纳出他们共有的宏观特性。没有包含人民群众的文革史料是不完全的。

现在看来，破四旧、抓鬼神、砸霓虹灯，揪走资派、斗教授和文攻武卫都是极其荒唐的事情。当然这首先要归咎于运动的启动者和决策人。但是数亿人民停产听课，积极投身到这样荒唐的一场运动，自然也有其自身的内涵。光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没有人民群众热烈响应，一拍即合，就不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历时10年的地覆天翻般的巨大风浪。人民在运动中的作用不可低估。简单地讲这场运动至少需要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有毛主席这样能叫人山呼万岁跪倒膜拜的绝代的领袖，一是那个时代有那种觉悟和素质的狂热的百姓。

文革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导方式，那就是领袖和群众的直接互动与呼应。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各单位迅速传达不过夜。老百姓则像过节一样敲锣打鼓，宣传庆祝。领袖和人民群众被某种纯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紧密地连系到一起。没有这样的人民，就不会有这样的领袖；没有这样的领袖，也不会激励这样的人民。毛泽东来自这样的人民，人民造就了这样的领袖。领袖调教了这样的人民，人民又无限忠于这样的领袖。

正如中国暂时还出不了华盛顿、林肯，美国大概永远出不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即使他们从中国花重金进口一位，比如习近平或薄熙来先生，拥护他的百姓也不会超过5%。然而在中国他们却可主宰万物，颐指气使，指挥几千万信徒唱歌，命令13亿人“自信”。文革中，中国的政治环境就像一个高Q值的光学共振腔，毛主席只要轻松地往里投放一枚红色的光子，上亿的人民分子们马上会把它放大数亿倍。

第一，中国的教育使得人民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2000年来，中国独尊儒术，克己复礼。臣事君，子尊父，连婚姻都要父母包办。皇帝至高无上。百姓没有任何独立思考的余地。共产党接管后，提倡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百姓要学雷锋做颗螺丝钉，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这些教义进一步禁锢了人民的头脑。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唯一能做的就是盲目地紧跟党和领袖。既然真理已经摆在面前，因而没必要再独立思考验证。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文人信奉学而优则仕，把读书当成做官的阶梯。他们要做的只是皇家的一条走狗，颂扬帝王的业绩，延伸统治者的权位。因此，尽管历朝历代出现过不少文人墨客、书法家，画家，但是很少有发明家。除了老祖宗的四大发明，中国近代在音乐、绘画、科技、医学等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突出的建树。因为他们不具备发明人所需要的独立思索的精神。解放后，运动接着运动，科学家被打倒，知识被践踏，中国的经济、科技水平像八一面粉的定价一样1毛8分4原地不动，除了卫星和原子弹，几乎拿不出什么新东西可以与人类分享。

改革开放后，虽然手里有了大把的金钱和高耸的GDP，但在尖端科学和工业技术上还是不

可望人项背。除了疯狂地购买贵族商品，名车、名表、名包，和克隆外国名牌，中国没有几样驰名世界的商标。还不如东方邻国日本和韩国。

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得数亿人民只会本能地高喊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而不会过问，他老人家要把你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第二，人民对政治的恐惧和敏感。由于解放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一片一片的人们被整肃、批判甚至枪决，中国人对政治有种恐怖感，即所谓的政治危险论。他们深悟出“枪打出头鸟，箭射开口燕”的险恶。于是这些人不管来了什么运动，都会心有余悸，小心谨慎，凡事盲从，从而不会被政治风浪吞没。

除了恐惧，还有一部分有野心想往上爬的人们颇具政治敏感性。他们没有自己的主见，但能够辨别风向。一旦风起，他们就会顺风而动。说党爱听的话，做党喜欢的事，于是会受到上级的重视，把他们当作依靠对象和管理百姓的工具。这些人不管来了什么运动，都会尽心尽力，推波助澜，甚至不惜编造事实，出卖亲友，落井下石，做出仇者快亲者痛的违心的事情。他们希望从中获取更大的好处。这种人是文革的中坚和催化剂。

第三，人民对伟人和皇帝的盲目崇拜。封建了几千年的中国，皇帝是真龙天子，文武百官在皇帝面前要三拜九叩，还得喊着：“吾皇万岁，万万岁！”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威与尊严。皇帝睡了个民女，民女还得承蒙雨露，谢主龙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1949年后，毛泽东同志当了主席，虽然不再称皇帝。但在百姓心中，他还是真龙天子。故而甘愿拜倒在大救星脚下。即使主席身边战功赫赫的文武百官，对他也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他要把某人拿下，不管职位多高，贡献多大，都得乖乖地束手被擒，或者干脆自杀。虽然他不是皇帝，但是毛主席万岁成了全国人民不得不喊的革命口号。

文化革命把毛主席说成四个伟大，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革命群众把毛主席当成真佛、上帝，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书店的货架上摆出的都是红宝书，人称红海洋。这些因素把人们对毛主席的迷信推向了高潮。在这种形势下，人民的思想已经完全禁锢，唯毛是从，为了他甘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人们像一群铁钉，被毛泽东的巨大磁场紧紧地吸附成一团，并且跟随着他投身于伟大的运动。文革就是人民群众集体演出的一场造神运动。

第四，中国人办事喜欢走捷径。他们深悟两点间以直线距离为最短的几何真理。从领导们开始，可以借用刀手，获得学位；买东西喜欢插队，办事情喜欢走后门；圈一块土地，一夜间暴富；别人发明的产品，我来山寨；利用特权，把子女送进耶鲁、哈佛；连孩子也要设法生在美国，为了赢在起跑线上。此外中国人喜欢赌博、集资和买彩卷，为了寻求致富的捷径。

这样强烈的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急于出人头地、摆脱贫困的向往自然使他们容易接受极端的新鲜的观念，从而把时髦的政治口号当成了富贵的捷径。当然，也不乏有众多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为求报国之路，轻信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把帝、修、反和五类分子当成阻碍国家进步的障碍，于是毛主席的手臂轻轻一挥，他们就会煽风点火四处串联。

第五，长期的小农经济。贫困落后的生活导致了仇富、仇权和仇有的变态心理。几千年来，中国人被束缚在土地上，家园和土地连到一起，而且喜欢世代定居在一个固定地方，那怕是穷乡僻壤。故而家庭、家族观念严重，思想保守、自私狭隘。小农经济框架里的人民更容易接受一个均富的社会，而共产主义打出的恰恰是这样一个旗帜。

由于靠天吃饭，再加上天灾人祸，兵荒马乱，改朝换代，因此，虽然勤劳节俭，但多数人一直处于吃糠咽菜但求温饱的水平。长期的艰难困苦容易养成仇富的心理。一旦有人提出过激的口号，如打土豪、分田地，他们就会啸聚山林，一呼百应。希望能够通过无偿占有他人的财富过上翻身解放的生活。

由于长期受到苛捐杂税的压迫，他们对官府敢怒而不敢言。一旦有人撑腰并提出打到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他们就会群起响应。给身居高位大腹便便的大官们戴上高帽，游街示众。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同时，由于国家贫穷，教育水平低，大部分人不能受到高等教育。而高级知识分子，高级演员、科学家的收入大约高于普通工人的10倍，生活相对充裕。故而在四人帮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煽动下，人们把怒气转移到这些人的身上，把他们关进牛棚，监督改造，甚至逼迫他们自绝于人民。

由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的广大农民对知识不够重视。诸如烧毁华佗遗著的民妇，以及失传的地动仪、木牛流马等。而知识分子又以诗词歌赋、书法作为致仕升官的工具，把巫医、乐师、百工之人，视为君子不齿。因此对于文革期间的停课闹革命和对知识界批斗教训视为理所当然，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了大革文化命。

第六，小农经济导致的自私懦弱。祖祖辈辈以家庭为单位耕耘在黄土地上，使得国人养成狭隘、自私的习惯。中华民族缺乏整体性的民族感和团结精神，容易在暴力面前屈服，宁可被暴徒一个一个地杀掉，也不愿群起反抗，牺牲自我。只有到了最危险得时候，才会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这种心理导致了人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同事或亲朋挨整或者陷入冤案的时候，他们表情冷漠，无动于衷，甚至为虎作伥，参与陷害。

有时，为了能保住自己，在关键时刻，还会屈打成招，嫁祸好友，伤害无辜。几十万个右派里，有几位拍案而起，横眉怒目；文革各个阶段揪出的5%的反革命们，有几位敢坚持真理，斗争到底？

中国人既不像海洋经济那样喜欢漂泊掳掠，也不像游牧民族那样征杀占地。他们欣赏内陆性关闭平稳的生活方式，安安静静踏踏实实地过小日子。因此养成懦弱卑恭的心理。对外常以防守妥协为主。对内则容易拜倒在权力的脚下，对外来的侵略者，缺乏反抗精神。尽管涌现出过云台28宿，贾家楼36友，岳家军，以及梁山泊的108将，但总体上这个民族还是畏惧强暴。文革的残忍和屠戮更使得人民低头忍辱，苟且度日。这也是四人帮能够横行10年的社会基础。

第七，造反精神。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中国人既有懦弱屈服的一面，又有揭竿而起，顽强抗争的一面。中国的统治者喜欢骄奢淫逸，因此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时常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于是官逼民反。中国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农民起义从不间断的历史，在改朝换代的同时，人民磨炼出的革命造反的个性。

文革中，伟大领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条最高指示很快地得到青年学生的拥护。不同于历代造反的农民，这次不是人民自发的暴动，而是在统治当局出示绿灯的情况下，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办法去造各级领导班子的反。中国人民的骨子里的造反精神于是得到了充分的、有人唆使和支持的发挥。虽然此造反非同于彼造反，但毕竟派生于同一种基因。

第八，宗教意识的欠缺。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宗教的概念，在神鬼方面，孔夫子又近乎唯

物主义者。没有神的牧放，没有宗教的制约，中国人的道德风尚可以好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是也可以坏得坑蒙拐骗，损人利己。文革打破了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失去了师生和上下级的尊重，把人与人的关系放纵到相互顷扎，尔虞我诈的对立的地步。

由于没有对神的信念与崇拜，他们容易把领袖吹捧为神圣，把毛主席当成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和伟大的舵手。文革中颂扬领袖的歌曲成百上千，几天几夜也唱不完。洞察秋毫的毛主席正是利用了宗教的缺口，把自己雕塑成解放全人类的真神。而老百姓们不知道耶稣，默罕默德，也不认同释迦牟尼，毫无戒备地把共产主义当成了宗教信条，把毛主席当成了创世纪里的耶和圣主。于是文革中的百姓对毛泽东宗教般的信赖烘托出历时数年的政治狂热。

三、文革会重演吗？

历时十年的文革煽动起宗教般的狂热把领袖推上了神坛，三忠于四无限。为了同一个圣主，为了同一种信念，人们分作几派，打来打去，杀红了眼。最后他们才知道上当受骗，科技教育青黄不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人提心吊胆诚惶诚恐，敢怒而不敢言。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文化革命还会否重演？

简单说来，鉴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再出现几位政治领袖容易，再高唱几年红歌容易，再揪斗几个走资派容易，再批判几个教授容易，但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地发动起一场文化革命，难！

邓小平副主席改革开放的政策打开了中国的半扇经济之门。让一部分国人率先富了起来，同时把中国的 GDP 提高到前所未有的辉煌。和文革前 60 年代初的形势相比，大相径庭。人们对财富和物质的追求远远高于理想和信念。就是天天都在高喊马列的官员也不得不把眼光盯在钱上，把孩子送往资本主义的国度镀金深造。此时即使毛主席从水晶棺中复活，再到天安门城楼振臂一挥：“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除了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几个疯子，大概没人再和主席一起呼喊。

今天的那些大款大腕，其财富可敌国，他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二奶们拎着几十个 LV、爱玛士，二爷们开着法拉利，喝着路易十三。他们会眼睁睁地看着造反派冲进金子堆的别墅，抢走他们的财产？何况他们已经进入政协、人大甚至党代会。政商已经溶为一体。造反派和他们相比，不过是流民草寇，难成气候。

今天的那些大官们，改革开放吊起了他们的胃口，引发了他们毒瘾。钱多得不知放到何处，房子多得不计其数。子女们非官即商，连孙子都开始上岗。说他们是走资派，那是抬举了他们。在资产阶级的眼中，他们不过是一群鼠窃狗偷监守自盗的蠹虫。他们之所以贪得无厌有恃无恐，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因此他们决不会允许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任人摆布，让火烧到自己。到时候，等待他们的恐怕不再是带高帽和游街批斗，而是脑袋瓜像葫芦瓢一样飘到水中。

今天的那些大学学生们，什么理想，什么民族，什么国家，都被放到个人前途与私利之后。他们追求的是学位、工作和高薪，是汽车和洋房。他们毕业后的第一选择是从常春藤的名校领一纸文凭。物质对追求远远胜于当初那些愚民的伟大理想。你对他们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要把文革进行到底。他们会问你病吧。

至于那些家长们，从孩子的幼儿园，就投上大钱，让孩子学习外语、钢琴、击剑。把幼升小，小升初，直到高升大当作人上人的阶梯，一个个争取插到起跑线的前边。他们难道会拥护一种运动，打断望子成龙的美梦，让孩子天真地去做红小兵、红卫兵，为了实现一种虚幻的狂

热，奉献他们的生命。

时代变了，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文革之剑已经深沉江底，即使它的影响尚存，但是死灰复燃的几率会小于1 / 1 0 0 0 0 。除了时代的变迁，一个重要的因素很难再现，那就是几千年才能出现一回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是在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他的威望是在几十年的征战中打拼出来，他是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孕育的一位奇才、怪才。他是时代的儿子，他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畸形的英雄。这样的人已经成为历史，已经永远地躺进水晶棺中。

然而，在某个局部地区、部门，在较短的时间里，重复文革的某些片断和插曲还是不无可能的。几千万重庆人在薄熙来的指挥下高唱红歌就是重温旧梦的一幕。他们用红歌来勾起对文革的情感，用红旗来扇起对文革的留念。重庆的红歌得到了党中央的默认，甚至唱到了北京。很难保证，红歌红舞不会在某时某地重现。

新的的领导班子上位以后，重新强调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强调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使命，独特的基本国情。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文革是在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后的应急措施，因此很难保证，当国家重新陷入新的危机时，不会有人铤而走险，重蹈覆辙。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这些孤注一掷的权贵们也必将和四人帮们一样，钉在耻辱柱上。

历史要前进，不会简单地重复。改革开放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瓶，新一代人的思想、追求和胸怀已经同60年代的百姓大不相同，他们更加注重的是个人的安危和利益，不会再用鲜血和生命去捍卫领袖毛泽东。新一代的领导们没有革命战争的那种经历，很难树立起绝对的权威，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尽管文革再现的几率很小，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仍然有义务把文革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愚蠢荒唐的运动。

四、尾声

尽管文革之火全面复燃的几率很小，中国和社会学者们还应当对它做一次严肃认真的审理和交待，弄清楚文革的背景、来路、条件和后果。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指导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才能把文革的影响与后遗症减小到最低微的程度。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因妖雾又重来。借主席诗词，反其意而用之。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二十九）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4 0 6 a 〕

第十章 回顾与反思

第一节 对于两派争斗，我的再认识

每个人的经历会给每个人的人生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每个人的经历对所经历事件的评价也会带上浓重的个人色彩。

关于团四争斗，审查和检查让我不得不时时回顾和思考。人到暮年常咀嚼记忆，不由得经常回想和反思。以往一些看法和观点，在社会变革的影响之下，在社会阅历的增加以后，在朋友间的探讨切磋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修正与更新。

虽然，团四两派早已作古，派性赖以生存的派利益这一土壤也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派情结、派友谊、甚至偶尔夹带一些派观点还是有的。这很正常，也无需掩盖。只是，不应该因此而影响对过往历史的客观评判和公正认知。

在清华文革初期，蒯大富是第一号蒯派，团派的一把手。沈如槐参加过“八八”派，是414的一把手。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人在派别属性上没有交集。我呢，是蒯派，也是“八八”派。后来又是团派（非“28团”的“团”，是“井冈山兵团”的“团”），最后是414派。也就是说，我的派别属性把蒯大富和沈如槐的都涵盖了。历数两派头头，像我这样对蒯大富和沈如槐各自的派角色都有过体验，先是兵团总部核心委员后又成为414总部核心委员的，唯我一人。我参加不同的派别，担当了不同的角色，使得我对这些派别都有一种切身的感知。所以，仅从这点而言，我应该更有条件做到客观公允地评论这段历史。但是实际上，囿于水平所限，我也做得不够好。下面这些比较粗浅和片面的文字算是我现在的一些再认识。

## 1、清华文革初期史是团四两派孕育、形成、争斗、消亡的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华文革初期史是团四两派孕育、形成、争斗、消亡的历史。

清华文革初期，可以细化成6个小的阶段。

### （1）保蒋与反蒋阶段（1966.6.1—1966.6.9）。

在这十天中，围绕着校党委是“延安”还是“西安”、蒋南翔是姓“马”还是姓“修”进行了激辩。认为应该肯定校党委、蒋南翔的，大体上就是肯定十七年是红线主导的，这正是414思潮最基础的观点。反对校党委、蒋南翔的，实际上就是认为需要“彻底砸烂旧清华”的，这也正是团派思潮的核心。后来，60.3%的反蒋分子成了团派，到414这边的只占32%，从中可以看出，在反蒋保蒋过程中就已经显露了日后团四两派分野的端倪。

### （2）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阶段（1966.6.10—1966.8.8）。

包括相当多反蒋学生在内，因对工作组的怀疑和不满导致工作组的敏感和压制。由此而掀起的反蒯运动产生了一个受工作组迫害的蒯派群体。蒯派后来成了团派的中坚力量（65.6%的蒯派加入了团派，在414这边的只占29.3%，挨整最厉害的著名蒯派几乎全在团派），而保工作组或者不反工作组的，绝大多数（68%）后来加入了414。

### （3）“八八”与“八九”对峙阶段（1966.8.8—1966.9.23）。

这一阶段，虽然工作组撤走了，但是它的势力、它的影响仍在。它的代表就是“八九”派。一部分虽然没有公开反工作组但是对工作组反蒯表示不满的成了“八八”派，与“八九”派抗衡。蒯派虽然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但是还没得到彻底平反和翻身，处于边缘状态。这一阶段中诞生的“八八”派后来成为414的中坚力量。

### （4）“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存阶段（1966.9.23—1966.1

2. 19)。

这一阶段，保守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八九”派逐步并最后退出了清华的文革舞台，以蒯派为核心的“井冈山红卫兵”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裂为“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井冈山红卫兵”因得到中央文革的明确支持而蒸蒸日上，成为第一大造反派组织。

(5)“井冈山兵团总部”与纵队派激辩阶段(1966. 12. 19—1967. 4. 14)。

这一阶段中，虽然以“井冈山红卫兵”为主实现了各个红卫兵组织的大联合，但是派别分歧依旧存在。在一个总部的面纱下，兵团总部(多以“28团”的名义出面)与其属下的纵队派(“八八”派)围绕反唐、反“八八”、整风及干部解放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6)414派与团派全面对抗阶段(1967. 4. 14—1968. 7. 27)。

这一阶段中，“井冈山兵团”从内部的两大派正式公开分裂成两个造反派组织。两个总部独立存在、各行其政。彼此由文攻恶化到大规模武斗。

我们可以看到，这六个小的阶段可以归并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前三个小阶段)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刘少奇及其在清华的代表势力和影响。这一阶段中，团四两派开始孕育，雏形初现，但两派之间的矛盾还未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到后一阶段(后三小阶段)，主要的敌人打倒了，保守派垮台了，原有的主要矛盾基本解决了，于是，造反派内部两派之间的矛盾围绕着该由谁掌权这一关键点上升为主要矛盾，并最后呈现白热化。

考虑到即使从“414串联会”成立算起，团四两派并存的时候也一年有余，占了整个清华文革初期的大部分时间。因而，把这之前十个月的文化大革命，看成是团四两派孕育、形成的过程，对于清华文革初期史的认识和把握，可能是一个新的视角。

## 2、两派基本都是错误的，但错误程度是有很大差别的

从指导思想而言，两派都是信奉毛泽东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化大革命理论，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路线的。

从行为实践而言，两派的表现都是极左的，都同样在做着批判刘少奇，揪斗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当时认为正确的事情，都在保护、解放一部分干部的同时打击、压制另一部分干部，互相激化矛盾最后导致武斗。

所以团四两派都是错误的，应该基本否定。对此，我想绝大多数普通的老团老四，已无异议。

但是，一谈起清华文革重大事端，两派头头与骨干在认识上的分歧还是很大，对这段历史很难达成共识。这主要表现在，有些老四要极力表白414比团派正确得多，有些老团要极力证明414与团派是半斤八两，没啥差别。

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偏离事实的。我的看法是：并不是414比团派正确得多，而是团派比414错误得多。

由于团派贯彻极左的文革路线比 4 1 4 更积极更紧跟，由于团派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而 4 1 4 一直被中央文革打压，由于团派始终处于掌权的多数派地位而 4 1 4 一直是在野的少数派，由于团派要“彻底砸烂旧清华”因而对干部的迫害比信奉“红线主导”论的 4 1 4 更甚，由于团派几次挑起武斗而 4 1 4 基本上处于招架的守势，所以，团派所犯的错误比 4 1 4 要大得多，责任也重得多。

譬如，两派对亮相到对方的干部都有批斗、抓抄、关押的行为。但是团派炮制了“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的冤假错案，专案组使用了毒打、罚站、乃至虎钳拔牙等等令人发指的手段，造成被关押的干部有伤更有死的极其严重的恶果。4 1 4 对团派干部最严重的错误行为是抓了陶森进行批斗并当作人质关押在科学馆里。

又譬如，在百日大武斗中，两派都有人员死伤。除了两派在武斗场上对垒时互有伤亡外，多名 4 1 4 人员都是被冷枪射杀的，或者抓住了打死的。这性质也比在武斗现场的伤亡要严重得多。

我的有些老四朋友，总觉得 4 1 4 的干部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解放干部上是有很大成绩的，看到当年亮相到 4 1 4 的干部在文革以后很多人担任了重要职位心里乐滋滋的。而一想到当年 4 1 4 上受中央文革的歧视，下受团派的打压，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后来，清理五一六，清查三种人，没有一样拉下的。虽说是温和的造反派，但是造反派的帽子现在已经是臭烘烘的。总之，情绪中既有自恋自慰，又有怨气闷气。

我的有些老团朋友，总觉得当年一心一意听党的话，跟着毛主席搞文革，最后落得悲惨下场。清五一六挨整，清三种人挨整，整得比老四要厉害得多。蒯大富坐牢了，武斗中打死人的都判刑了。老四的头头即使挨整也不厉害，亮相到 4 1 4 的干部后来都做了大官。总之，不少老团觉得虽然犯一样的错，结局却比老四要惨多了，不公平，不服气。

我想说，对老四而言，像抓关陶森，都是错误。如炸高压线，都是罪行。是错误，就要勇于认错、道歉。是罪行，就要敢于认罪、救赎。这点是不能含糊的。不能因为所犯的错误轻一些少一些就可以沾沾自喜。对老团而言，要心悦口服地承认团派的错误是要严重，责任要大。

老团老四都应从个人的怨天尤人中挣脱出来，不应再过多指责对方的责任，淡化自己的错误。我们对无辜的师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无法狡辩的错与罪。

我非常欣赏陆小宝这句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话：要“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为历史，为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如果我们能把最后责任的内容再延伸一点，无论是老团还是老四，不仅应该留下亲历者的回忆，把这场人类历史上最荒诞、最巨大的浩劫的罪恶无情揭露出来，我们还要留下当事者的惨痛教训，留下觉悟者的深刻反思，为了我们的民族和民众今后不再遭受文革这一类的历史悲剧。

### 3、两派群众的政治热情、民主意识及理想主义是最值得肯定的

我认为，团四两派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心系民族命运的政治热情、自觉参政行使监督的民主意识以及心有信仰的理想主义是最值得肯定的。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政治，政治总是影响着我们。不管我们需要不需要文革，我们不得不被卷入文革。

文革初期，在没有党团组织领导和约束的环境下，我们全都积极地投身到事后证明是错误的文革运动中去。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全错了呢？是不是没有丝毫可以肯定的呢？我认为不是这样的。起码有三点，是应该值得肯定的，是应该继续发扬的。

### 政治热情

那时的我们，绝大多数都是抱着关心国家大事、心系民族命运这样一种政治热情参加文革的。

我们承认，我们很幼稚，相信走资派是我们的最大敌人。我们很天真，认为毛主席是绝对不会犯错误的大救星，共产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指路人。我们很正义，要让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修，劳动人民不受二茬罪吃二遍苦。我们也很愚蠢，多年的洗脑已经让我们失去自我，不会也不敢用脑子对一些根本问题进行独立思考。

是的，我们可贵的纯正的政治热情被人利用了。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一个骗子，指挥几个疯子，蒙蔽一群傻子”的“骗子疯子傻子”论很有市场。但是“傻子”不会永远傻下去，经过事实的教训，“傻子”会看穿“骗子”的把戏，不再受“疯子”的指挥，“傻子”们是会觉醒的。

不能因为上过当受过骗就对政治热情自我否定。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宝贵的政治热情被别有用心政客所利用。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广大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任何时候都应该抱有关心国家大事、心系民族命运这样一种政治热情。

所以，在1989年学潮中的广大学生，他们的政治热情是应该完全肯定的，是应该得到保护的。

任何一个公民，关心国家大事、心系民族命运与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明智的执政者，应该鼓励、保护国民的这种政治热情。只有那种仅仅为了便于统治而把国民当做只须干活的顺民，才要诋毁、摧残这种政治热情。

当年，“逍遥派”是个贬义的称谓，做个逍遥派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这显然是片面的。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学，在保校党委工作组中站错了队的同学，还有黑帮子女等，都不敢积极参加文革，不得不变成游离在运动之外的逍遥派。随着团四两派的恶斗，武斗的升级，更多的人感到无所适从，心生反感，因而逍遥派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这实际上是广大师生对文革无奈、消极的一种表现。

随着文革的被否定，两派的被否定，文革“逍遥派”这顶帽子成了香饽饽。骄傲地宣称自己是逍遥派，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而造反派成了“打、砸、抢”、成了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三种人”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种认识同样是片面的。我知道不少造反派头头曾以造反派的身份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了许多诸如保护干部保护文物的好事。而那种对国家大事莫不关心，借串联之名，行“并联”之实的真正逍遥派，总非我所欣赏的。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是政治挂帅，只要政治思想好，就一好百好，视金钱为粪土。后三十年是金钱挂帅，腰缠万贯，才是成功的标志，对政治十分淡漠。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这是民智不成熟的表现。当今，对于富裕起来的人们，强调一下关心社会大事，心系民族命运，关注民主民生，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 民主意识

文革中的“四大”武器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虽然都是很有局限性的，但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积极参与学校的治理，监督掌权者的权力运用，这样的民主意识空前高涨。所以，当年不管“井冈山”是多么的响当当，不管蒯大富是多么的红得发紫，它的所作所为，他的一言一行，无不处在全校师生尤其是对立面的监督之下。

有关民主意识的问题，在下面“否定文革，我的一孔之见”这节中还要详细阐述。

## 理想主义

当年团四两派群众绝大多数都有着共同的政治信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最后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的理想。我们是一群有理想的青年。

政治热情饱满、民主意识浓厚、富有信仰理想，我认为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几十年以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我们年轻时热衷的政治绝大部分是错的，我们的民主意识还很幼稚很初级的，我们的信仰和理想是乌托邦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加以肯定呢？错误的，认识到错了，可以改。只要注入正确的内容，就能重燃政治热情，重建民主意识，重塑理想主义。一个没有政治热情、没有民主意识，没有信仰理想的年轻人，则是非常可怕的，如同没了灵魂一般。

沈如槐说过“我们无怨无悔”。这话常被一些人批评为他对自己的错误不知悔改。我想说的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感到非常痛心，非常追悔。每每思及，夜不能寐。不论反思的深度如何，我们都在不断地反思。

我们所以说无怨无悔，是因为我们此后的遭遇尽管比较坎坷，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我们不为个人的遭际而怨恨，因而“无怨”，我们为国为民、为民主、为理想而努力过，奋斗过，因而“无悔”。

我们所以说无怨无悔，还因为是在文革初期那样一种法纪荡然无存、暴力肆虐的险恶环境下，我们还是尽力坚守着道德的底线和良知的边际。我非常欣赏赞同沈如槐写的这段话：“也许，我们（当年）所坚持的东西算不上什么真理，但我们确信我们至少也是在坚持正义、道德和良知。我们是在坚持真、善、美。而正义、道德、良知，真、善、美是区别一个人、一个组织的最最基本的标准。”或许，正是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和政治伦理，是我与沈如槐能一直携手一年多共同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的根本所在。

## 4、成立“4 1 4 串联会”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在4 1 4总部成立以前，以纵队派和“4 1 4 串联会”形式出现的4 1 4派与团派之间，在对解放以来的十七年和文革前的旧清华的评价上，在对造反派如何正确地对待自己、如何正确地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如何正确地对待干部等问题上发生过重大争论。其中，尤以在干部问题上的争辩最有深度。可以说，团四两派围绕着十七年和干部问题等的大辩论是两派争斗中最为精彩的华章。有关双方的主要论点，沈如槐在他的回忆录中做了相当全面的总结和归纳，我就不再赘述了。

尽管那时大字报上所用的言词也是相当激烈的，充斥着火药味，但是多数大字报引经据典、



调查研究，力证自己的观点，还是比较说理的。那时的大辩论也不时有抢话筒和互相推搡这样的粗鲁动作，争辩的气氛有时也很火爆，但都还属于“文斗”的范畴。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并非只有极左极右的两家。每个人都在独立思考，从争论中受到启发，在思辨中得出结论。

这精彩一幕的出现，是与“4 1 4 串联会”的成立密不可分的。“4 1 4 串联会”的成立，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有积极意义的，是起了正面作用的。

在大辩论期间，观点相同或相近的战斗组之间必然会互相支持、声援，彼此必然会串联、交流，会有一种联合起来宣示更大的力量、发出更大的声音、力求更多地影响清华文革走向的冲动。于是，“4 1 4 串联会”就应运而生了。早期曾出现过的“八八”、纵队派也为孕育“4 1 4 串联会”做了必要的组织准备。当干部问题成为学校运动的重点和焦点，“4 1 4 串联会”的诞生犹如瓜熟蒂落般的那样自然。

在社会上，有不同的群体就存在不同的群体利益。不同的群体会形成不同的组织，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在“井冈山兵团”内部，出现了占主导地位的团派和持不同政见的4 1 4派。这两派的交锋与争斗是良性的正面作用还是恶性的负面作用，全看这两派是如何互动的。

如果兵团总部把“4 1 4 串联会”视为与“2 8 团”一样的下属组织，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允许“4 1 4 串联会”的合法存在，搭建各方平和交流观点的平台，听取合理有益的建议，这对兵团总部而言，实在是一件大有裨益的好事。当然，“4 1 4 串联会”方面，也应该扮演一个起建设性作用的角色，而不是做一个胡乱搅局一味对抗的反对派。真要是这样，清华两派虽然存在，但不至于会恶化到组织分裂并最后演化为武斗的地步。

不幸的是，“4 1 4 串联会”刚一成立就做了强夺广播台这样鲁莽出格的举动，显示出这个反对派不够合格。处于关系主导地位的兵团总部以此就把“4 1 4 串联会”定性成“复辟逆流”、“非法组织”，不允许反对派的合法存在，则更是错上加错。蒯大富没有意识到他应该站在两派之上，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井冈山兵团”的领袖，而自甘矮化委身在团派里面，只做了团派一派的领袖，这是很失策的。

在文革路线下，当时两派都奉行斗争哲学，都自以为自己是革命最正确的。所以，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要实现良性的互动其实是极难的，不太可能的。

纵观“4 1 4 串联会”成立前后的清华运动，“4 1 4 串联会”的成立客观上激化了两派的矛盾，这是消极的影响。但是，“4 1 4 串联会”的成立大大增强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抵制，深化了对文革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争辩和揭示，强化了对蒯大富和团派错误的批评和斗争。相比而言，积极的作用更为显著。而以自由结社方式表达群体诉求所彰显的进步和有效在今天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mailto: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